

于
逢

金水長流



贈

厦門大學圖書館存

于季

五九三十一月

新

刊

圖

金水長流

于 逢 著

花
城
出
版
社

粤新登字05号

金水长流

于逢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插页 310,000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60-1465-1 / I · 1804

平装本定价：11.80元

精装本定价：15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七十年代初，南方油城建筑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。徐维新在几年动乱中平步青云，党委书记程东海及其得力助手周毅华成为他的障碍。女电焊工凌凤霞过去受感做了他的妻子，后逐渐看清其面目。周毅华不幸丧偶，凌凤霞为照顾两家孩子，经日常接触，对周毅华产生同情和爱情，结果跟他一起离开南方油城，奔赴新的油田。

书中展开场面气魄宏大，提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尖锐问题，值得一读。

自序

三十年前的往事，如今已成为历史。当年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狂风恶浪，席卷神州大地，造成疮痍满目，伤痕斑斑，但这也考验着真正的忠勇者。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成了中流砥柱，屹立于天地之间，而于台风眼的刹那光明中，特别显出那雄伟的形象。黑暗到底是有尽头的，而黎明的到来，则要经历着漫漫的长夜。本书所写，就是工业无产者际此时会所创造的丰功伟绩。他们有苦恼也有欢乐，有爱也有憎恨，有个人恩怨也有共同奉献。而作为一个集体，它体现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，并显示了中华儿女的勇敢、勤劳、智慧的素质。

我于1958年到茂名石油城生活。当时这里是一片黄土荒原，正进行着开天辟地的战斗。回来写了几堆废稿，但从此结下了不解缘，经常下去。到七十年代初又住了近两年光景；回来写了此书；为了冲破过去的种种禁忌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先后三易其稿。感谢茅盾同志，他知道我这意图，生前再次为我题签，书名《金水长流》。也感谢茂名石油公司，予以热情资助，使其终能出版问世。我是永远忘不了茂名，茂名人也似乎没有忘记我。去年初冬再一次“回娘家”，新老同志都一见如故，畅谈欢聚。茂名现在建成我国最大的炼油基地，除了老厂的高塔如林，还要展现出30万吨乙烯装置的宏大景观。它今天已有了自己的港口，码头伸展在水东海滨。我和老朋友们极目远眺浩瀚的南海，环视海湾周围无边无际的木麻黄防风林带，迎着猛烈的海风，我似乎已忘记自己是个老人了，朝气蓬勃胸膛，而衷心地为下一代工人祝福！

于逢

1992.7.20.于广州

第一部

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快要过去，初夏即将到来。金江平原上去年刮了几场强台风，又经过严冬，万物凋零，气象肃杀。接着又一直下着连绵细雨，此时天空却逐渐放晴了。乌云慢慢散开。金色的阳光终于以无比的威力冲破了浓密的云层，洒向大地，照得周围闪闪发亮，鲜艳瑰丽。从炼油厂飘过来的石油味，也变得清淡了。原野换上了浓绿的新装。田地都插上秧了，青青葱葱。眼下石油城里马路中心的花坛上，粉红色的月季花已经开过第二遍了。

城里到处都是木麻黄林。木麻黄排成三列纵队，守卫着一条条笔直的沥青马路。木麻黄连成一道绿色的长城，保护着巨大的炼油厂，拥抱着一个个工人村。这些村子墙壁上到处贴着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期的大字报，还写上乱七八糟的标语口号。大字报经过一再互相覆盖，加上风雨洗刷，已经片片剥落，花花斑斑，只剩下什么“打倒”、“火烧”、“砸烂”和“最新指示”之类的断章残句，字迹都看得不很清楚了。而金江市革命委员会的

安民告示已处处张贴，十分显眼，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现象将要结束了，人们不禁舒了一口气。

罗冈村是石油城里最老的工人村之一，坐落在一带起伏不平的山坡上。周围的木麻黄格外高，绿荫也格外浓。环绕着池塘，展开了一大片平房和一幢幢两层、三层的楼房。平房区西南端，靠近池塘，在一列参天的木麻黄的荫蔽下，住着一户姓周的人家。丈夫周毅华，今年三十九岁，河南人，是建筑工程公司党委的常委兼安装第一队的党支部书记。妻子贺淑梅，三十四岁，也是河南人，参加街道的缝纫合作组，回家就是烧饭洗衣服。大女儿周燕，十四岁了，在市里中学念初中；小儿子周川，不到七岁，还在幼儿园。

傍晚时分，贺淑梅在等着丈夫回来吃饭，心里有点生气，也很着急。丈夫这次去参加学习班，跟平常不大一样，时间长，纪律严，快一个月了，只回来过两次，看了看孩子就匆匆忙忙走了，脸色严肃，话也不多说。现在左等也不见他，右等也不见他。贺淑梅就不等了，亮了电灯，自己和孩子吃了饭，开始收拾碗筷。却从门外气喘吁吁地走进一个人来。贺淑梅认得他是安装一队的起重班班长柯金水。年纪约莫四十岁，体格健壮，方脸浓眉，胡子拉碴，穿一身油污的工作服，戴一顶安全帽，显然是从工地来的。他说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，见贺淑梅听不大懂，支书周毅华又不在，只好转身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走了。跟着又来了一个人：身材高大、两颊胖乎乎的，年纪不过二十岁，是徒步走来的。他近日来过多次了，叫做梁根生。也说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，却比较流利好懂。他来找周支书，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话：他到起重班当学徒工不合适呀，要求调换工种呀，显得愁容不展，满怀心事，一脸憋气。

“快一个月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”他瓮声瓮气地问。话都说完了，却低着眉毛，还是坐着不动。

“我也不知道呀！”贺淑梅只好让他坐着，自己蹲在走廊上开始洗碗筷。

“这批学徒工很多嘛！谁都没有分配到起重班，为什么偏要分配我？”他提出质问，显然把贺淑梅当成周支书本人了。

贺淑梅笑了起来，像哄孩子似地安慰他说：“这个我怎么知道呢！组织上分配的事我不懂。等老周回来，我告诉他就是了。好吗？”

梁根生没有答话，讪讪地走了。

周毅华的事真多呀，大家都要来找他。多少年来他都是忙得团团转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是一个群众组织的主要成员，整天奔走串连，开会讨论，写大字报，要揪管理局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柳浩明副主任，这样打起了“造反”旗号，主要为了防着别的群众组织来工地冲击生产。后来全市“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”了，两派“一碗水端平”，实行“军干群”三结合，各级领导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又提出“抓革命促生产”，要“工业学大庆”，他参加了一个个大会战，没有停过。去年秋天，炼油厂里又要建两个装置，一个叫蒸馏，一个叫催化裂化。催化裂化装置的安装施工，主要由安装一队负责，他就搬到工地去住了。只有星期天在家休息，却也不得安生，不是这个人来寻，就是那个人来找。他们谈的都是工地上的事，贺淑梅听着弄不明白，只觉那里一派热火朝天，万马奔腾，叫她内心向往不已。她想，一个家，一个缝纫组，一个工人村，是多么小呀！很想出去见见世面，但自己却不是工人，连个临时工也不是，怎么去呢？而且学习又少，什么都不懂。她这样想着，就有点埋怨

自己的丈夫了，埋怨他不关心家里，不关心她，也不了解她。可是见他一天到晚在忙，人也瘦了，胃病又像要发作，过去受伤的左腿又显得不大灵活，她又觉得自己错怪他了。

贺淑梅洗了碗筷，等到九点多钟，还不见周毅华回来。小川不知什么时候溜到谁家玩耍去了；小燕已经坐在桌前开始做功课。她于是到左邻右舍去串门。她想，在这附近和周毅华一同去学习的也有好几个人，不如去打听一下吧。其中一个较熟的是徐维新，也是工程公司党委的常委，就住在池塘对面那幢三层楼房里。他的妻子凌凤霞，和她很要好，经常来往，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天天见面，互通消息，交换意见，是很投契的。这个广州妇女比贺淑梅小三岁，贺淑梅是看着她搬来罗冈村养下女孩的。她是安装一队的电焊工，常有事来找支书周毅华，两个人就熟起来。她喜欢贺淑梅待人温厚，贺淑梅喜欢她泼泼辣辣；后来听说她解放前是个孤儿院里的孤儿，自小无父无母，就对她有着一份深切的同情。但贺淑梅却不大喜欢她的丈夫，总觉得这个人对人有点敷衍冷淡，说话也装腔作势。不过“造反”时候他风风火火，涨红着脸孔满城跑，大喊大叫，在工地把周毅华当做死对头。但现在都过去了，只要大家心里没有介蒂就好。……现在，贺淑梅一边沉思，一边绕过池塘，向着那幢三层楼房慢慢走去。

徐维新、凌凤霞和他们的小女孩都在家里。他们住的是二楼朝东南的大小两个房间。客厅正墙当中用相架挂了个毛主席像，周围贴了红色的“语录”纸，以及“样板戏”的图片。书架上排列着“红宝书”。桌子上立着一个洋娃娃玩具，桌面摆着一块玻璃板，玻璃板下压着他们俩的结婚照片。这真是一个充满生

气的幸福家庭啊！的确，自从徐维新去年提升为工程公司党委的常委，他们家就从楼下搬到二楼上来了，住的房间也一变为二，而且朝南。一些家具是新买的，客厅的布置充满了政治气氛。现在，这个家的主人徐维新穿着一套干干净净、平平整整的工作服坐在藤椅里，把女孩放在膝上玩着。他年纪三十四五岁，长脸疏眉小眼睛，下唇微翘，头发剪短，样子看起来很英俊。凌凤霞则把日间的工作服换了，穿一条蓝斜布裤，披一件灰的确良外衣，把衬衣的白领子翻出来。她坐在旁边拿着梳子正在替女孩梳小辫子。见有人来，就不好意思地站起来，仿佛给发现了秘密似的，脸上显出羞涩的神色，但掩盖不住眼里的快乐光芒。

“贺大姐！坐，坐。”她连忙推过一张竹椅来，又去倒茶。她长挑身材，脚步轻快，摆动着两条长辫子，还像做姑娘时候那样。

“老徐同志晚上不出去走走吗？”贺淑梅先向徐维新打招呼。“你们今天学习结束了？”

“唔，结束了。”徐维新说话一向不冷不热，有点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“周支书不也回来了吗？”凌凤霞向贺淑梅微笑。

“还没有。也不知他到哪里瞎跑去了。”

“啊，不错。”徐维新说，“他是回催化现场去了。听说出了点小事故，他就急急赶回去了。”

“现场上出了事故？……”贺淑梅心里不安起来。

“不怕的，贺大姐！”凌凤霞安慰她，横了丈夫一眼。“这算什么事故？只是水管焊接不好，试压时候漏点水罢了。返工就行。老周同志看了就会回来的。小霞霞，你为什么不叫阿姨？

来，叫阿姨！”

“阿姨！”小霞的声音清脆得像小鸟。

“乖！”贺淑梅故意问：“小霞几岁了？”

“告诉阿姨，你几岁了？”

小霞不肯说，咬着嘴唇，伸出了三个指头。

“来，小霞唱个歌给阿姨听！小霞会不会唱？”

“我唱歌歌。”小霞翻身跳到地上来。

这是个胖娃娃，梳着两根翘起来的小辫子。辫梢上扎着两只红蝴蝶。红喷喷的圆脸孔，乌黑发亮的两颗眼珠。她看着贺阿姨，咬着小嘴唇，要笑非笑，右颊上显出了个深深的酒窝，很像她的妈妈。经妈妈的一再鼓励，她于是正正经经站着，好像在幼儿园那样，摆好姿势，就大声唱起来。有几回想笑又不敢笑，唱到最后一句忽然害了羞，躲到妈妈的怀里，不肯转过脸来。三个大人都笑了。凌凤霞心里充满了欢乐。

大家逗着小霞说笑了一会。妈妈又要她跳个舞给贺阿姨看。她怎么也不肯，反而要到街上去玩。凌凤霞只好叫徐维新带她出去。贺淑梅也起身告辞，凌凤霞却留住她：

“贺姐，你再坐一会，替我把辫子剪短。辫子一长，讨厌死了！”凌凤霞蹙起眉头。“留着长辫子干活很不方便，要盘起来，戴上安全帽，麻烦透了。我今天钻进油塔里焊塔盘，焊得焊得，辫子就掉下来。我早就想把它剪短了。”凌凤霞一边说，一边走动，去找剪子，搬椅子。

“你那老徐答应吗？”贺淑梅口里含笑。

“答应是答应了，可是……”凌凤霞停了停，转口说：“我才不管他，我要剪就剪呗！头发是我的，又不是他的。”

屋子里只有两个妇女，空气活泼了，说话也随便了。凌凤

霞坐在镜子前，贺淑梅站在她身后，拿起剪子。她们比划着，研究要剪多短，怎么剪，又用塑料带子把辫子上截扎了起来。她们对着镜子，一边剪，一边说话，又互相看看。镜子里照出凌凤霞那微黑的俊脸孔，嘴边带着笑意，一双大眼睛乌溜溜的，喜欢侧着头看人，带着小猫样的神气：大胆、好奇、又有点野性。她两颊泛红，容光焕发，显然自觉生活在快乐和幸福中。贺淑梅呢，个子小，身体也不健壮，梳着短发，圆脸孔，细眼睛，神态温顺。她站在凌凤霞后面，就像个大姐姐。凌凤霞辫子剪短了，一摇头，左右晃动，就像个小姑娘。贺淑梅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小凌，你瞧你现在变成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！”

“哪里！老了！”凌凤霞把贺淑梅一推，一面收拾剪子等物，回避着对方的好奇眼光。

“你算什么老！年纪轻，身体又好，当上了电焊技工，能为国家多作贡献。我才老呢，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围着锅头打转转呀！”贺淑梅叹息了一声。

“哪里话！你参加缝纫组，又做街道工作，难道这不是为人民服务？”

“唉，这就差得远了！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去当临时工？土建队现在还很缺人，不需要什么技术的。”

“可是老头不让呀。”

“老周同志不让吗？”凌凤霞笑起来。“嘿，想不到他这样落后。我见到他，可要给他一顿批评！”

“对着哪！”贺淑梅也笑了。“小凌，这件事你可要帮一帮我的忙。我提了好几回，他都不让，总是说，搞安装我没有技

术，不行，搞土建要拚力气，又怕我吃不消。左一个怕，右一个怕，就是不让我去。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全市贴满大字报，批判走资派，工地上又火辣辣的，页岩干馏炉呀，延迟焦化装置呀，修的修，建的建，又一部部开动起来；学‘毛著’呀，学大庆呀，学‘铁人’呀，闹得热火朝天。大家都进步了，我躲在家里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管为老周担着那份心。现在好了，不搞武斗了，又抓生产了，闹腾腾地。我呢，却给拉在后面。小凌，你说我的心有多急啊！老徐好，他理论高，能帮助你。可是我那老头呀，一天到头就是忙，回得家来谈不上两句话就跑了。快四十岁的人了，还是咋咋呼呼的。老徐比他年青，可比他老成多了。老徐对你又好，又能帮助你！”

“不不不！”凌凤霞连连摆手抿着嘴说，“你别替他吹了！他这个人可主观哩！我们常闹点小别扭，你是不知道的了。”

贺淑梅趁势说：“你替我问问老徐，土建队是不是真的要人？”

凌凤霞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听说还要招一批家属工。现在炼油厂里工地上两个装置同时搞，安装一队和二队正在展开竞赛。土建忙得不可开交，原来就不够人，……喏，老周不也是公司党委的常委吗？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。”

贺淑梅生起气来：“他回来就是不作声嘛！怕我要去。说真的，你替我问老徐好不好？”

“老周不同意呢？”

“这回我拿定主意了，要跟他狠狠吵一架！”贺淑梅把手一摆，又像认真，又说笑。她忽然凑到凌凤霞的耳边悄悄说：“你知道，他是最怕和老婆吵架的。”

两个妇女子是一齐笑了起来。

二

贺淑梅坐在卧房窗前灯下翻着书，等候丈夫的归来。

好几年了，市里两大派群众组织互相斗争，到处乱纷纷，罗冈村也不得安宁。夜间，市中心还常有枪声传来，零零星星，也实在叫她害怕。待丈夫从炼油厂好好地回来了，她才放下心来。去年秋后就平静多了，职工都依时上下班了，村里生活恢复正常，商店也开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关门。现在，夜深了，左邻右舍都没有什么声响了。窗外很黑，只有几支路灯还在亮着。宽阔的塘面泛出青色的幽光，这是炼油厂上空大片光雾的反照。远处传来虫鸣声，配合着炼油厂那边飘来机械运转的深沉的嗡嗡声，显得夜更静了。

一辆自行车发出轻轻的她所熟悉的声音，自远而近，从塘边经过，转上水泥行人路，跳动了一下，就来到家门前。贺淑梅开门迎了出去，帮他放好自行车；见他浑身雨粉，两肩和两膝都湿透了，就用干毛巾替他上下拍拂，一面埋怨说：

“你看你这冒失鬼，放着雨衣也不穿，宁愿淋雨。当心得风湿病！”

“一点小雨没关系，穿雨衣可气闷得很哪。”

周毅华亮起客厅里的电灯，撩开蚊帐看孩子，见两个人都已睡熟了，就回到卧房，把湿衣服换下来，靠着桌子慢慢抽烟。

刚才他一进门，贺淑梅以一个妻子的敏感发觉他的脸色跟平时不大一样。他这次去党校学习确实有点异常，回来过三次，什么都不说。她知道这是党的纪律，也就不问。但见他似

乎老大不高兴，笑声也没有平时开朗，就猜测可能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。她想，也许他因为催化安装搞不好，捱批评了，于是进行试探：

“怎么？这次学习很紧张吧？”

“唔。”周毅华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
“要不要搞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？”

“搞了，批判了错误的东西。”

“你捱了批评没有？”贺淑梅终于问。

“捱批评有什么稀奇呢？很平常嘛！”周毅华笑了起来，两眼快活地闪动。

贺淑梅看着于是放了心，就把柯金水和梁根生来找他谈的事情都说了，问他在工地见到了他们没有。

“柯金水见到了，那十五吨吊车明早就去运回来。”周毅华说。工地上习惯把起重机叫“吊车”，或简称“吊”。

“听说你们一队和二队展开劳动竞赛，你们一队给拉下来了，是不是？”贺淑梅故意问。

“劳动竞赛是为了互相促进，不是要争输赢呢！”周毅华笑了，顺手翻翻摆在桌上的书本，问道：“你近来读些什么书？‘毛著’学得怎样？”

“还在学《为人民服务》。”贺淑梅故意瞅着丈夫。“这个我学来学去都学不好。我还没有能很好为人民服务啊！”

周毅华知道她又要提出问题来和他辩论了。到底让不让她出去工作呢？他一直拿不定主意。每次厂里招临时工，她都向他提出过要求。但他考虑到，招工名额有限，别的工人家属要去，就让人家先去吧。这样一直拖到现在。其次他又想到，她个子小，体质又弱，怕她到工地吃不消，群众影响不好，于是